

學林

◀ (上接11版)

辗转难忍泪。”罗庄不嫁之初心既违，婚后虽恪尽人母、人妻之本分，却又家难频作，生活之苦可以想见。文学创作上，婚后也因生存环境之不易所作不多。无怪乎其夫周延年叹曰：“使孟康而不嫁余，从容吟咏，其所诣当不止此。今十余年间，仅成一卷，则余负孟康者何如也！”(周子美：《初日楼稿》跋，1957年油印本)

当然，除国难、家难外，亲人故去也成罗庄的重创。1924年，罗庄弟君鱼因肺病过世，罗庄有数首作品悼念之，并因伤心过度而患病。1935年，次子世禄患伤寒病逝，罗庄有《大江东去·题五龄童子遗墨遗照》一阙伤悼之。1940年，素来疼爱她的伯父罗振玉病逝于旅顺。罗庄辗转得知后，悲痛欲绝。以上种种交织，令其最终盛年而亡，殊为可叹。罗庄之子周世光云：其“本可从容吟咏，然九年内三子一女出生，抚儿女，料米盐，不胜辛劳；又值倭寇侵华，屠戮劫掠，避乱流离，饱受惊吓；更遭次子世禄五岁夭亡、伯父雪堂公病逝切肤之痛，致生母心力交瘁，气体渐衰，病肺三载，竟致不起”(《初日楼稿》跋，上海辞书出版社2013年版)。

性喜填词与原因之探

罗庄《初日楼稿》数部，尤以词为多。这源于其自幼聪慧，性喜填词。而这由多方面原因促成的：

其一，天赋使然。罗庄自幼颖慧过人，读书颇具悟性，这也为日后其自悟为词之道奠定良好的基础。其父罗振常在《祭长女庄文》中曰：“汝幼时由予授读，仅毕‘四子书’而止。诗古文辞，初未讲授，汝乃摸索而自得之，下笔即斐然成章，尤工于长短句。”天赋有之，悟性有之，故虽因外力而被迫弃学，其也能自学成才。一则在女红为妇女第一要义的传统中，罗庄不得不迎合世俗习女红而辍读。母亲希望罗庄能事女子之正务，同时也并不完全杜绝其为学之路，其母在《初日楼续稿》序中云：“长女庄幼即嗜读，余既嘉其勤学，又恐其荒女子之本务，恒以为忧。稍长，乃舍去而专攻针黹。且佐余理家政，抚幼弟，日无余晷。余喜其知所本也，偶有把卷，辄不之扰。”二则时事使然，家境渐趋窘困，在父亲无暇顾及子女的教育之际，其偷偷自学以成所好。随着家境每况愈下，父亲罗振常因生计而奔波于外，故罗

庄“渐长辍读，专习女红，然犹耽坟籍。家无长物，陈编蠹简尚所不乏，庄暇窃读之，或误针黹，遭母责不能竟弃也”(罗振常：《初日楼正稿》序，1921年上虞罗氏铅印本)。及至稍长，罗庄已对词有自己的见解，并小有所成，罗振常云：“偶小病，整理旧词遣闷，有当时未录存者，向索必得，知其好此。因与论诗词，多中肯语。稍稍奖之，乃踟蹰出一小册，则所作俨然成帙矣。阅之，颇近自然，不类初学，而词为较胜。”(同前)这些不得不说是罗庄的聪慧、其对词的天赋领悟力和由衷的喜爱故而成之。连并不十分赞成女子舞文弄墨的母亲张筠也不得不由衷赞叹：“夫庄自幼时，夫子粗授以文义，即糊口四方，初未加以启迪。乃他人钻研毕生，或尚未得途径者，庄以随意得之，此固天也，非人也”(张筠：《初日楼稿》序)。

其二，家庭学养之耳濡目染。罗庄的母亲张筠为名门之后，是一位有文采的女性，著有《练潭书屋遗集》传世。父亲罗振常虽因生计而无暇兼顾子女的教育，然家庭中所营造的文化氛围，尤其在词方面潜移默化的熏陶是罗庄性喜填词的重要原因。罗振常在《初日楼正稿》序中云：“而予家藏诗甚少，词则名家几无不备。予又多作词少作诗，亦濡染使然也。”家中丰富的名家词集收藏给罗庄提供了学词的物质基础，潜移默化中影响了她对创作文体样式的选择。父亲多作词少作诗同样潜移默化中影响了她的选择及对填词的认同，让罗庄参与词集校对等工作也在文学实践中强化了她对词的体悟，“夫子早岁作诗，后乃辍作，顾烦忧无可写。乃复作词，尝命庄清缮旧稿，时亦命其助校前人之词。故庄于词尤好，而所作亦工于诗，出语多惊宿誉”(张筠：《初日楼续稿》序，1927年上虞罗氏铅印本)。

其三，填词符合其气质秉性。词之为体，要眇宜修。作为女性，词更成为一种性灵之文学，伤春悲秋、感时伤事等等，兴之所至，无不诉诸笔端。罗庄作词，兴至而为，以女性的细腻与灵性，不刻意剪红刻翠、逞才使学，摒弃时人无病呻吟的有意为词之敝，成其“韵事”。这一点也颇得其夫周延年赞赏：“昔人谓填词为小道，殆以其无关于民生国计，非学者之急务也。若有闺帏能于中馈余闲，以之抒写性情，则亦不失为韵事。孟康内子雅擅倚声，运笔空灵，含思温婉，深得词家正宗”(周子美：《初日楼遗稿》序)。”所以，罗庄本人对词体的喜好以及词体与其气质秉性之相符，造就了她在词学上的

成就。

为词之路与创作述评

纵观罗庄的为词之路，主要集中在三个阶段：

1908—1921年，女红针黹之余的涂鸦初学。此期以状写春花秋月、流连光景之作为多。罗庄在《初日楼稿》卷末自记：“儿时趋庭受四子书，粗知文义。年十二三，从母氏攻针黹，料米盐，遂废读。然心之所好，乘隙辄把一卷，间学为吟咏，不自知其当否。絨稿于篋，未敢出之。……盖诸作大率流连光景，而祇及春秋，不言冬夏。古人谓春秋多佳日，登高赋新诗，良不我欺。平日喜秋爽尤逾于春和，故秋情尤多，兴之所至，不能强也。”这一时期是罗庄独自摸索为词之道的时期。由于父亲为生计忙碌而奔走，母亲又不太支持女子舞文弄墨，故罗庄只有在闲暇之际把卷自学小词，故作词尚处于模仿、摸索的阶段，在词境上多有重复。诚如其所言，纵观集中诸作，大多为吟风弄月，流连光景之内容。如《浣溪沙》一阙：“瑟瑟芙蓉颤晚霜，萧萧木叶下寒塘。深秋急景太凄凉。白日时闻虫斗响，西风乍起雁成行。城头吹角又黄昏。”萧瑟之秋景较春明更容易呈现出深沉的意蕴，然依旧不离伤春悲秋的主题。然这一时期部分词作却展现出一定的家国情怀，于一闺中女子而言，实属不易。这部分词作主要集中于罗庄十八岁时随家人东渡日本时期。在日期间，罗庄创作了不少作品，皆描写了西京悠然于世外的淳美，冲和淡远。然而，“虽山川信美，惜非吾土，终难已故国之思”(罗庄：《海东杂记》)。如“漫说终非吾土，消愁抱、且自流连。”(《满庭芳·避地至日本西京，山川信美而不能减故国之思。寻幽既倦，感成此阙》)、“故园庐舍应无恙，竹树知生第几丛”(《鹧鸪天》)、“回首神州，一夜乡心万斛愁”(《减字木兰花·壬子中秋》)等句，皆流露出背井离乡之人的故国之思。这一时期的作品虽于艺术性而言，笔触尚显稚嫩，然由于罗庄远赴日本之经历的特殊性，不能不说给其词作增添了某种更深沉的内容，这些作品也成为这一期词作中的亮点所在。

1925—1927年，闺友唱和论学之活跃期。继1921年罗庄父亲为其刊刻《初日楼稿》后，罗庄创作经历了几年的沉寂期。1921年《初日楼稿》刊刻后，罗庄因忙于家事等原因，创作并不勤。尤其是长弟君鱼于民国十三年即1924年21岁时

早逝，罗庄除了几首悼弟之作外，几乎搁笔。“今自辛酉年成诗词稿一卷，从此遂少所作。甲子季春，鱼弟兰摧，为有生来未经之奇痛，则更文通才尽、君苗砚焚”(罗庄：《初日楼续稿》，1927年上虞罗氏铅印本)又因“哀悼殇弟，当食而哽，遂罹胃疾。”(罗振常：《祭长女庄文》，《初日楼遗稿》，1942年钟灵印字机印本)。1925年6月，因其伯父罗振玉六十大寿，罗庄赴天津为之庆贺，罗振玉因见其气体不舒，身形消瘦，特留下她调养，直到第二年春天，罗庄才返回上海家中。罗庄《初日楼续稿》卷末小记记载了这段吟风弄月的时光，“津寓群从多诸嫂妹，朝夕聚晤，蒙古升相国女孙飞霞、云锦两世妹，又相与论学，不虑岑寂。除忆两亲外，时复欢笑，乃稍稍加餐，气体渐复。闺友多欲得所作，时有赠答之什，所积渐夥。归后一年，不废讽咏。”故从1925年到1927年夏《初日楼续稿》刊刻前，是罗庄创作的活跃期，而尤以唱和赠答之作为多。诚如罗庄所言，因酬唱赠答之作多口占为之，故作品于字斟句酌相对不足，出艺术上的精品则尤难。“余维稿随时积，亦当学与年进，《续稿》所作，强半与人赠答，且往往不容思索，迫令口占，境虽较熟，然熟则易流，难得绵密坚凝之作”(《初日楼续稿》，1927年上虞罗氏铅印本)。然而，经过了前期漫长的摸索和创作上的初探，从词创作艺术而言，此期罗庄于词体创作已颇为娴熟，也可视为其创作的成熟期。当然，尽管艺术上臻于成熟，然由于词作境界的相对狭隘，故此期的词作仍给人以面目雷同之感，但亦有可观之作，如其悼亡鱼弟诸作《临江仙·晚检鱼弟遗稿，凄咽就睡。中夜梦醒，倚枕成吟》《浪淘沙·鱼弟忌日，慈亲命偕季妹、俩弟设奠斋中》《金缕曲·鱼弟忌日》等，即胜在情真，沉痛淋漓。

1928—1937年，多病多难之际的零星创作期。这一时期作品不多，一方面罗庄由于婚后日常生计的操持、子女的陆续出生和养育重任以及家难频作；另一方面，罗庄因鱼弟过世后，因悲伤而落下病根，虽在天津经罗振玉一家细心调理后已大有起色，然依旧体弱多病，身体状况不佳，故于文学创作而言，少了一份闲适的空间和吟咏的情怀。但这一时期有一个重要的现象，即罗庄的作品开始走出闺阁，出现在公众的视野。1928年，“暮春，侍父母赴杭州游西湖，尽室偕行，留连数日，殊惬意。仿欧阳修《西湖好》词，联章成《采桑子·西湖好》十阙，均刊登于《词学季刊》第一

卷第二号”(罗静、周世光：《初日楼主人罗庄年谱》，《初日楼稿》，上海辞书出版社2013年版)。另一首词《减兰·王季淑姊斋中昙花开，半日而敛。初放时以摄影术留其形，制为小帧，分诒同人。悬之壁间，因题此阙》也刊登于1933年同一期的《词学季刊》上。《词学季刊》刊登的女词人作品并不多，同一期刊印二十二首作品，而罗庄作品竟占了十一首。1939年，罗庄病重之际，钱单士厘自北京来书问疾，并请罗庄告知近著，欲将其作补入所著《清闺文艺文略》中。罗庄病逝后，单士厘《悼初日楼主人罗孟康》“尺素无缘达，仙凡遽已分。芳徽虽未晤，佳句已传闻”等语，恰恰说明了罗庄其时早已文名在外。

抗日战争爆发后，由于战事严峻，罗庄避地浔溪，几近搁笔。此期较有明确时间指向的唯有1938年3月罗庄辽宁探望罗振玉之际所作《被兵脱险，渡辽省伯父母，敬步伯父原韵》。之后，罗庄病情急转直下，同年4月回上海，“九月二十九日，忽发头晕症，乃贫血所致。十一月二十三日吐血，医者曰病肺”。1939年7月，“延淮安名中医刘树农来诊，谓庄病已甚，来春恐危殆”。1940年，“庄病加剧，频吐血。雪堂公自闻其病，屡致辽参。五月，雪堂公罗振玉病逝于旅顺。家人不敢即告。数月后，庄辗转得知，悲痛几绝”。1941年，“春，刘树农复来诊，曰：庄病已不可治。三月十七日，移居金城里邀园公宅。二十六日大吐血，二十七日子时卒”(罗静、周世光：《初日楼主人罗庄年谱》)。故1938年之后，其病体支离，作品几绝。

罗庄生非其时，生活于忧患之境，其唯有于文学中暂觅愉悦之心境，诚如罗振常所言，“汝之愉悦心情只在伸纸疾书之候，外此皆愁苦之境矣。”罗庄聪慧过人，悟性颇高，尤喜填词，也获得外界认可，其夫周延年云，罗庄“早年既有集行世，人多激赏之。时朱彊村、况蕙风两前辈方结词坛于海上，颇喜汲引后进。闻蕙风甚欲致孟康于女弟子之列，而集中未见诸老一言弁首，心颇异焉。后乃知外舅心井老人恐盛名损福，不欲其有声于时而谢之也。”(周子美：《初日楼遗稿》序)其父爱女之心拳拳，然罗庄纵使聪慧过人、才华横溢，最终亦因家国之难、生活琐务而香消玉殒。假使换一清明盛世，使其能恣意为文，罗庄于词学的创获将不可限量。所以，从某种意义上而言，罗庄的命运正是当时一代才女命运的缩影。

(作者为华东师范大学中文系副教授)